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定位的理论视点与价值选择

张务农 李爱骥

摘要: 一所大学的成功可以归功于其卓越的战略规划,而学科发展规划是这一规划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并不存在一个普适的一流学科内涵与衡量框架,因而需要为具体学科寻找一个适合的战略发展方向;并不奢望一所高校在一流建设中平衡所有的价值,因而需要为具体学科寻求一个适且的价值引领方向;不能指望仅从外部为一流学科建设规划蓝图,而是需从内部为学科发展寻求持续推动的力量。基于这一认识,一流学科建设战略规划定位应以“特色优势论”和“学科生命论”为理论视点。前者可以为学科发展提供一个平等的竞争平台,避免学科建设陷入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后者根据学科的“生命属性”和“生命阶段”进行学科规划,关照学科发展的全生命过程,而不是只关注那些已经成熟的优势学科。基于上述认识以及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理念,一流学科建设规划应以“知识活动”为基本起点;以“特色规划”作为价值取向;以“学科生命”作为实施依据。

关键词: 一流学科; 战略定位; 特色定位; 学科生命

中图分类号: G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1)04-0054-09

由于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什么是一流学科、一流大学一直是一个可论争的话题,它并不存在一个恒定的内涵,也不存在一个普适的概念框架体系。既然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的特色是各有千秋的、一流学科的衡量标准是多元的,甚至是可创造的,我们可以把学科建设的重心放在具体学科及其相应的组织自身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上。这也说明,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为一流学科的发展进行战略发展定位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需的。通过这样的探索,我们认识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不仅仅是已经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占据了优势的精英大学的盛宴,也可能是每一所行业特色高校可以达成的梦想。

一、概念论争与一流学科建设战略定位问题的凸显

一所大学的成功可以归功于其卓越的战略规划。^[1]同时,学科发展又与学校战略规划密不可分,学科的发展状况不仅决定了大学的层次、也决定了一所大学的类型和结构。^[2]因此,一所大学的战略规划必然落实到学科的战略规划上来,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规划就成为大学战略规划的实施性命题。但前提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关于什么是一流学科的概念定位作为其定位基础。然而遗憾的是,通过研读相关文献并不能找到一个统一的关于一流学科的理解,反而是为一流学科建设打开了另外的致思空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新时代我国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究”(BLA190215);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河南省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与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202400410294)

作者简介: 张务农,男,河南鲁山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等;李爱骥,山西汾阳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一)并不存在一个普适的一流学科内涵与衡量框架,因而需要为具体学科寻找一个适合的战略发展方向

一般认为,在国际上著名学科排名机构那里可以找到一流学科内涵的权威解释,进而为我国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指引,然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国际上几大排名机构对一流学科内涵的阐释和具体衡量指标的设置有很大差异。我国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仍需在研究这些衡量指标的同时,寻找适合自身的定位。

例如,在QS(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US News(美国新闻)、THE(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ARWU(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四大学科排名机构的指标体系中,ARWU的学科排名指标体系是最强调学术研究指标的一个。ARWU的六项衡量指标包括获奖校友、获奖教师、高被引科学家、论文数、高质量论文比例、科研经费,几乎全部指向了科学研究,而且均采用可衡量的客观指标来计算。而在QS的学科排名指标体系中,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均为主观评价指标,此两项的权重根据学科不同可达70%~100%,剩余权重则分配给了“篇均被引”“H指数”两项指标。在四项指标中,学术声誉包含有宽泛的内容,是对学科(包括教学质量)的整体性评价,而雇主声誉则直接指向了“人才质量”。US News则是一个更为均衡的评价指标系统,所有的评价权重平均分配在全球学术声誉(根据学科不同权重最高为20%)、区域学术声誉(根据学科不同最高为15%)、论文总数、书刊总数、会议论文、标准化论文影响力、论文总被引数、论文高被引数、高被引论文百分比、国际论文合作指数十项指标中。而THE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赋予了教学最高达37.5%的权重,而且将“创新性产业收入”(最高赋值5.0%)纳入进来。

应当说,这些排名机构指标体系指标分配的多样化恰恰说明了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的多样性,以及世界一流学科标准的差异性,甚至也说明了一流学科标准的“可创造性”:一流学科既可以是研究型为主要特色的、亦可是以社会服务为主要导向的,亦可是以知识转化为特色的“创业型大学”。因此,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最关键的并非是在国家层

面建立一个行政化、制度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而是要通过政策引领各高校在学科建设中进行精准的战略定位,最终成为各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

(二)并不奢望一所高校在一流建设中平衡所有的价值,因而需要为具体学科寻求一个适且的价值引领方向

价值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正当性的基本原则。^[3]学科的价值也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我们显然无法指望特定客体能够满足人的所有需求,因此,一个学科如果能够满足人的特定方面的需求,并且在这个方面做到极具特色,在行业里面排名世界前列,“每当有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如果我们相关学科的老师会被邀请去做专题演讲,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的学生都希望来上这门课,那个学科就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学科”。^[4]在这方面,欧林工学院显然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成立于1997年的欧林工学院每年平均只招生80多名学生,其年轻的历史、数量有限的师资,使其无论如何都无法在QS、US News、THE、ARWU四大学科排名机构的学科排名体系中名列前茅,然而仅凭其独立的办学精神和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全球的工程教育权威专家把欧林工学院排在了MIT、斯坦福等名校前,并被写进了《全球一流工程教育发展现状》(The global state of the art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的报告中。^[5]

因此,就学科的具体特点而言,一门学科无须在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和知识转化方面样样出色,而是要根据其内外部条件选择一个合适的价值突破点。因此,从价值取向来看,一流学科可以是科学研究型的,能够取得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可以是教学特色型的,像欧林工学院那样在教学改革领域特索出了举世关注的成就;也可以是社会服务型的,在服务地方发展、传播地方文化、引领社会价值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还可是创新创业型的,在知识转化、创新创收方面达到行业一流水平的。如此,学科建设就无须陷入等级化的竞争阶梯里,也无须陷入求大求全的发展困境里,而是在多元化的竞争环境中绽放异彩。从而使学科发展逃离壁垒森严的高等教育等级系统,融入

到百家争鸣的高等教育生态结构中。

(三)不能指望仅从外部为一流学科建设规划蓝图,而是需要从内部为学科发展寻求持续推动的力量

从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推动力看,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个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推动,一个是世界高校排名机构的有力牵引。教育主管部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遴选了一定数量的世界一流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不仅通过财政公共预算进行支持,而且动用国家的力量对这些学科的建设情况进行评估。但是,国家对一流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对于具体学科的发展而言只是一种外部的力量,其对一流学科的建设至多是一种宏观的指引,而且过度依赖国家的引领容易导致一流学科建设模式的趋同,而同质化的一流学科群并不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理想状况。而对世界高校排名机构的亦步亦趋只能是在追求世界一流学科的“形”,而不能通达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魂”。^[6]因此,在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过程中,尽管不能忽视国家政策的引导和规制,也无法完全忽视世界大学权威排名机构的风向标,但关键的还是从学科内部视野出发寻求发展的突破口。因为一流学科并不是一组外在的指标体系的达成,而是“具有鲜明的文化浸入特征,投入要素之间相互耦合且与学科软件环境充分融合”。^[7]

因而,基于学科本身的战略发展规划就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和根基。一流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与管理不仅遵从一般组织战略管理的长远性、指导性、协调性、全局性、竞争性等特点,而且更应突出战略管理的动态性、创新性两个维度。而且后两者是一流学科战略规划的精髓所在。而这种动态性和创新性就是一流学科建设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创造性地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起来的一流学科建设思路。而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协调大学内外部环境的关系、协调学科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还要协调学科组织结构的调整与完善、优化有限教育资源配置、完善学科内部管理制度。一流学科建设的生命力和价值就存在于这一动态的、充满创造性的战略规划过程和战略实施过程中。

二、扎根大地与一流学科建设战略定位的理论视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8]这句话有着更为广泛的辐射意义:在学科建设的战略定位中,最根本的就是让学科发展深植于现实的土壤,以构建学科发展的生态群落。基于这一认识,一流学科进行战略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至少应当包括“特色优势理论”和“学科组织生态理论”两个理论视点:

(一)特色优势理论:创建不一样的世界一流学科

对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分析的维度,周光礼曾经提出了内外两个合法性维度,其中内在的合法性维度是指学术维度,既包括产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也包括拥有世界一流的教学、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外在的合法性则是实践标准,即面向“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9],具体包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引领价值文化方向,甚至要为当地生态文明做出贡献。^[10]这一分析应当说全面概括了大学学科作为一个总体应当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定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但是,并不能指望一个特定学科在所谓的“内外合法性上”都达到世界一流。一所高校是可以只在一个合法性维度上达到世界一流的。因此,上述合法性理论虽是一个“完美”的分析框架,但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框架。也有学者提出,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应当包括“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在两者权衡取其重的过程中,更应当重视“社会逻辑”。^[11]这种分法略显粗犷,但根本的问题是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嫌疑,在基本的认识论上陷入了将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进行排序的困境。而我们的看法是,一流学科建设在进行战略发展定位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由选择更重视学术逻辑还是社会逻辑,这种选择只是学科办学定位的差异,而不是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孰轻孰重的衡量。

另外,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来确认世界一流学科呢?一般会认为,一流学科这

个概念必然对应着“非一流学科”，一流学科是同类学科中金字塔的塔尖，是众多非一流学科衬托出来的，即在同类学科中存在着一个鲜明的等级结构。于是，国家层面的一流学科高于地方层面的一流学科，地方层面的一流学科高于地方非一流学科，在同类学科群中形成了一个“尊卑”的秩序结构。由此，非地方一流的学科想按照地方政府的评价标准进入地方一流学科的建设体系，地方一流本科学校想按照国家的评价指标进入国家层面一流学科建设的方阵。于是，在教育主管部门层面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面前，本应丰富多彩的一流学科建设工程，沦入了高度趋同化的激烈竞争之中。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学科生态，而是会加剧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的马太效应，使强者恒强，弱者更弱，丧失自己应有的特色。这样的学科生态，也只能让一流学科在强力政府的襁褓中孵化，而不会在地方的田野中自由生成；只能让诸如高职院校的一流学科只能局限在高职教育的系统中，而不能与“985”高校的一流学科同台争锋；也无法让诸如欧林工学院那样的世界一流学科脱颖而出。

因此，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定位应当是以“特色优势”论为主要理论依据。所谓的学科建设的特色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新”。^[12]如此理解，一流学科和特色优势学科两个概念就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虽然特色优势学科未必都能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但世界一流学科都是特色优势学科。如此认识，可以为各级各类高校的学科发展打开空间，让任何学校的每一个学科都有机会在特色中突围，成为独一无二的学科。同时学科发展的特色优势论也允许一流学科建设在战略定位上可以把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任何一方面作为自己的主要突破方向，甚至是唯一突破方向。世界一流学科既可以是在教学改革领域做到像欧林工学院那样、抑或是在科学研究领域做到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那样，拥有一人^[13]即可在人工智能这一研究领域排名全国三甲；也可以是在社会服务、公益项目方面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成为同领域学人向往的圣地。一旦如此，便可以弱化那些僵化的评估指标，在某一学科领域巍然屹立；也可以让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学校和不起眼的学科心怀梦想，依靠自

己的创造力成就一流学科传奇。

（二）组织生命理论：尊重一流学科的生命属性与生命周期

学科的组织生命理论来自组织学中的种群生态理论，意指学科有自身的生命诉求和成长规律。^[14]学科的组织生命理论至少包含两层内涵：学科是有生命的自组织，学科发展有一个生命周期。

尽管外部力量规制了学科的发展样态和发展空间，来自外部的权力能够“诱导”“推动”“制约”学科的发展，使得“大学学科制度的运作模式与运作过程中蕴涵着诸多权力控制因素”^[15]，从而把学科发展纳入权力博弈的框架，甚至使学科的发展在“政府的服务导向、高校的排名导向和学者的成果导向”三方面呈现出价值冲突^[16]，但是学科根本的成长和发展来自组织生命的力量。自组织才是学科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决定了学科发展的可能和限度，决定了学科发展的“行动空间、生长过程、生态系统、生长方向”。^[17]具体而言，学科发展的战略定位根本来看应当就是政府、高校和学者、学生、家长、社区综合因素影响的一个结果，应当避免外部行政权力过度介入而导致的学科间持久、无序博弈，按照自身生长规律规划学科发展。换言之，成就一流学科的不应当是政府相对僵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应是排名机构基于各自不同立场的排名指标体系，而是学科自然发展的结果。排名指标体系和政府考核指标只是对学科发展的一种诊断，而且不一定是适切的诊断，并不是目的。我们更应该根据学科的发展特色调整指标体系，而不是根据特定指标体系改变原有的发展特色。这也契合国际上学科评估的未来走势，即“由外部强制性评估机制转向大学自愿问责机制”。^[18]

从学科发展的生命周期来看，一流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则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考量。但总的来看，考量一个组织在其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状况，是对组织进行战略规划的前提。徐操志曾归纳了考量组织发展阶段和状况的三个分析框架^[19]：第一个框架是“以阶段划分为主要特征”的组织生命理论，主要研究组织的生命周期，分析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点以及各个阶段之间跃变的条件；第二个框架是“以问题为特征”的生命周期理论，旨在分析组织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分类,以及各类问题在组织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以及应对策略;第三个框架是“以文化为特征”的生命周期理论,把文化分析作为组织生命发展的焦点,因而非常关注组织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变革。这一认识,为我们对学科战略规划至少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学科发展同有机生命体的发展一样,可以划分为“生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蜕变期”几个阶段^[20],这些阶段是自然连续的,是自然生长的,虽然不同的学科在具体表现上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大学一流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首先要对学科发展的阶段进行诊断,了解学科发展现状,从实际出发进行学科发展战略规划,同时分析学科发展每个阶段的具体特征,针对性进行规划,进而创造条件使得学科能够在不同阶段之间顺利跃变。其次,突出问题导向,澄清学科发展中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对问题进行分析、分类,预判学科在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及这些问题的表现,并制定出解决思路甚至具体方案。最后,文化是学科发展的灵魂所在,在一流学科的发展指标、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三方面,学科文化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21]因此,要把文化分析作为一流学科建设战略规划的基本任务,制定一流学科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科文化建设策略,以文化变革推动一流学科建设的深层次蜕变。

三、价值取舍与一流学科建设战略定位的框架探索

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定位同企业组织的战略定位一样,要有牵引学科发展的组织愿景,进行学科发展的战略分析、制定出具体的学科发展战略、进行战略实施必要的保障措施和战略发展控制。在具体的定位原则上要遵从分类定位原则、服务面向原则、功能效益原则、市场竞争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等。但是一流学科建设又有自身特殊性,我们根据既有认识、结合组织定位的一般原则和技术,以及一流学科建设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下列一流学科建设战略定位的框架和具体策略:

(一)以“知识活动”为起点进行一流学科发展战略规划

尽管大学必须面向社会的需求和政府的意志,但知识活动始终是大学存在最基本的基础。以至于伯顿·克拉克在论及大学的知识活动时说:“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等教育的‘生产车间’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研究一门门知识的专业学者,这种一门门的知识称作‘学科’,而组织正是围绕这些学科确立起来的”。^[22]学科建设既不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也不是随波逐流的产物,前者可能导致政府的要求与学科自身的能力条件不匹配,后者则会使学科建设进入盲目攀比的恶性螺旋,造成学科因为重复性建设而在短期内达到同质性过剩。同时,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既不是“校长或董事会董事的个人愿景”^[23],也不是数字指标的设定,将学科发展等同于办学指标和具体数字的实现。^[24]学科的发展与规划是以知识生产活动为核心的,而学科的服务面向、人才培养均由此生发而来。有了正确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有竞争力的知识活动,不仅能够保证学科更好地服务社会,也能够培养出有竞争力全面发展的人。同时,保证了学科建设的知识活动,也就使一流大学建设拥有了健康的“细胞”,因为这是大学(学科)这个组织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区别。

当然,学科组织不能仅仅停留于“知识活动”,否则它就和专门的研究机构无法区分,它必须以知识活动为基础,然后去服务社会、创造价值、培养人才。这几方面是和谐统一的:学科的知识生产活动质量和水平决定了学科以及学科所在的高校能够服务社会的程度和力度:脱离知识活动的质量和水平要求学科的服务面向是不可能达成的。因此,一流学科建设的具体规划顺序依次为:知识活动规划、人才培养规划、社会服务规划。知识活动放在社会服务之前,是因为在不能履行培养合格人才的基础上,一味强调产学研结合和知识转化的学术资本主义都是无法在伦理上自洽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将人才培养放在学科规划的最基础起点,虽然可以将它设置在整个链条的核心;因为没有一流的知识活动,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教学。因此,近年来一些声音呼吁高校应该把教学放在第一位,试

图将重科研轻教学的伦理选择转换为重教学、轻科研,这种非此即彼的看法是不可取的。而且知识活动本身既包括原创性的知识生产也包括教学过程中的知识活动,两者紧密联系。没有高质量的知识生产活动,只靠知识的传递无法支撑其大学人才培养的合法性根基,这样的教学迟早被人工智能彻底取代;而那些无可取代的创新性知识活动恰恰是教学以及人才培养的精髓。

(二)以“特色规划”作为一流学科战略规划的价值取向

特色规划是大学学科发展规划的应有之意,是因为当前有两种力量在消解大学学科的特色。一个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25]的不断扩张。这种教育哲学主张从消费者的视角规划学科的发展,以至于经济社会的需求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塑造大学的形态、影响具体学科设置,那些不能带来直接经济社会利益的学科不断被挤压甚至淘汰。总之,追求高深学问的大学以及作为其细胞的学科不断受到学术资本主义的浸染。虽然迎合社会需求的学科建设也可以做到“异彩纷呈”,但那些不能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学科正在黯然失色。其二是大学排名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响。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对ESI高被引学科、诺奖等著名奖项的获得、科研转化资金的衡量方式正在将学科发展的自由边角镶嵌上整齐的篱笆,让学科发展转化为一组同质化数字的达成,让学科建设“盯着指标体系,缺什么补什么”^[26],以至于原本参差不齐但丰富多彩的学科发展样态转化为一组指标体系修剪后的整齐队列。

因此,在“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影响不断扩张背景下,有必要强调“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强调“遵循内部学术的驱动方式开展教学和科研”。^[27]这要求学科的知识活动不局限于从社会需求演绎而来的知识探究活动,而且能够保持独立的自由探索领域;同时让学科发展不再依附于各类排名机构的指标体系和政府的评估考核指标体系。即一流学科的发展,既要满足社会需求,也要满足基础研究学科和自由人文学科等。所以从方法论上来看,“特色规划”应当是高校学科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特色学科是与大学学术传统、文

化、战略、声誉、区位等并存的大学核心战略资源之一,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所在”。^[28]

因此,在具体的学科建设规划中可通过“教学知识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两个维度的分析来实现某一学科的特色规划:首先根据这两个维度可以把高校的所有学科分入十字坐标的四个象限:教学强和科学研究强的一流学科(分布在A区学科);教学强和科学研究相对弱的学科(分布在D区学科);教学弱和科学研究强的学科(分布在B区学科);教学弱和科学研究弱的学科(分布在C区学科)。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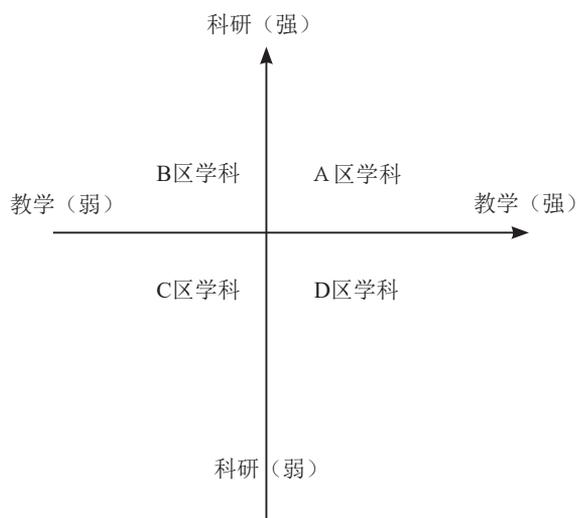


图1 学科定位分布图

而一流学科定位可以是A、B、D区域学科的任何一类学科。这种定位的选择不仅基于学科的发展环境条件,也基于学科自身的发展特点。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学科处于不同的地域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能指望一个学科在所有方面均衡发展,而应结合实际条件突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学科本身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社工类的学科就比较强调社会服务,其一流水平主要体现在学生社会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精神的塑造上;而基础数学和天体物理学的一流水平更多体现在其研究成果的水平上。因此,一流学科的战略定位,在初步确定学科在哪个区域(象限)定位之后,进行SWOT分析,具体分析内外部条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等,必要时采用SWOT矩阵量化分析来确定更好的选项。

学科发展的特色定位需要一系列制度上的保障。一般大众对高等教育水平的认知比较看重大学的综合排名而不是具体学科,导致高考学生在选择志愿时更看重大学的排名,而对具体学科排名的观念较弱。这说明大学总体排名的社会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学科排名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把好大学等于好学科。诚然,好的大学有好的平台,为具体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不尽然。转变这种状况需要在制度安排上更多宣传学科特色优势的价值,并对民众普及相关知识,扩大具体学科的影响力。

(三)以“学科生命”作为一流学科战略规划的实施依据

上述关于一流学科战略定位中特色规划的论述涉及的只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学科定位内外部环境分析,是一个切片分析。同时也说明了学科的发展环境是基于一个平台的竞争结构,而不是一个等级秩序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即一个学科办出特色,可以一步从普通学科跃变为世界一流学科,就像欧林工学院的发展路径一样;而不需要在制度的设置下,一步步从金字塔的底端往塔尖迈进。由此,一流学科也就不是少数的塔尖上的幸运者,而是一个更大的空间和平台。但是上述分析更多的是从物质条件来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学科发展的历时性特点,也没有考虑到把学科作为一个生命体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但两者也存在内在联系,学科的特色规划是学科作为生命体这一命题成立的前提。学科的生命只能是建立在“特色的基础上”,学科的生命也只能从丰富多彩的学科群落中汲取营养。因此,把“学科生命”作为一流学科战略规划的实施依据就要把学科作为唯一的、独特的、有不同发展路径的生命体来对待。对学科发展进行规划,首先要判定学科发展的阶段,然后根据不同的阶段制定合适的实施战略。尤其是要判定学科发展的关键期,抓住机遇进行跃变式发展,做到事半功半。

当前,在依据学科生命周期对学科进行战略规划方面,一些学者也做出了不同视角的探索:从宏观的层面看,有研究指出我国学科建设总体经历了“学科发展的战略扩张期”“学科发展的战略维持期”“学科发展的战略收缩期”“学科发展的战

略跃升期”四个阶段。这构成了具体学科进行战略规划最为直接的宏观背景。从微观的层面看,有研究表明,一个学科凝练出研究方向并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周期平均为20年,经历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蜕变期四个阶段。^[29]而学科成熟的标志则是“研究领域、方向的不可替代性;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可持续的知识产出;稳定的资源获取;明晰的组织结构;规范的学科制度;良好的学科传统和较高的国际化程度”。^[30]因而在学科形成期采取资源集聚策略,在学科成长期采取特色发展策略,在学科成熟期采取产出为主和文化建设策略,在学科蜕变期采取战略调整与变革策略。^[31]因而在进行具体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时,不仅要考虑具体学科这个微观生命体的发展状态、发展阶段,抓住关键期进行战略规划和发展;还要处理好具体学科生命与宏观学科发展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交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要真正把学科作为一个发展的生命体来对待,仍需要做一些观念和管理层面的调整。即一流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主要依靠内生性力量,而不是靠外部行政性力量的遴选。通过教育主管部门遴选来建设一流高校的悖论是:一个学科若没有通过这个筛选机制,就无法建设“一流高校”。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应具有居于国内前列或国际前沿的高水平学科,学科水平在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中进入前列,或者国家急需、具有重大的行业或区域影响、学科优势突出、具有不可替代性。”事实上该文件关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定位是对一个处于“成熟期”的学科的要求,旨在从那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学科群体中遴选重点学科进行建设,并没有观照到学科的发展前期。因而这种行政性的遴选措施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如果将一流学科建设作为一个发展的生命体来看,就不应当仅仅关注那些已经成熟壮大的学科,而是要关注所有的学科,在制度上为学科创造自由生长空间。这就需要淡化遴选机制,强化学科动态评价,尤其是通过形成性评价激励学科健康快速发展,而不是通过强化遴选机制,制造一个学科精英俱乐部,将更多的学科排斥在外;也不是主观和客

观地(一流学科遴选体系带有浓厚的排名竞争色彩)制造一个学科的排名体系,让有望和无望的学科在学科金字塔的阶梯上拼命挣扎。另外,就是突出学科建设特色甄别,淡化各类排名指标体系牵引,将学科建设的外部指标体系固化转变为特色生命的绽放。这可能需要进一步下放办学自主权和变革高校管理体制,改变一流学科建设中央高校一家独大的局面。最后,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就是进行学科组织变革,释放一流学科内部的生机与活力,而关于学科组织具体的变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撰文探讨。

参考文献

- [1] 杰瑞德·柯亨. 提高质量/转变职能:以卡内基-梅隆大学为例[A].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二辑)[C].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264.
- [2] 钱佩忠, 宣勇. 学科发展:大学战略规划的基础[J]. 教育发展研究, 2006(23):54-58.
- [3] 石中英. 教育哲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130.
- [4] 徐立之. 香港大学校长:大学为理想不为排名榜[N]. 新华每日电讯, 2012-08-21.
- [5] 教育:知名工学院欧林的三个办学特色[EB/OL]. (2019-05-15) [2019-08-09]. http://www.sohu.com/a/314028669_100268083.
- [6] 靳诺. 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形”与“魂”[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6(6):3-8.
- [7] 李志锋, 梁言. 文化浸入与要素耦合:世界一流学科组织化建设策略——以中美两所大学材料学科为比较案例[J]. 江苏高教, 2019(3):113-118.
- [8] 彭飞.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EB/OL]. (2019-05-31) [2019-08-17].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9/0531/c1003-31112365.html>.
- [9] 周光礼, 武建鑫. 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1):65-73.
- [10] 周光礼, 武建鑫. 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1):65-73.
- [11] 袁广林. 学术逻辑与社会逻辑——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价值取向探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9):1-7.
- [12] 林健. 战略视角下的大学管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238-239.
- [13] 中国高校AI论文影响力:清华多点开花, 中科大凭一人排第三[EB/OL]. (2019-08-09) [2019-08-10].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292439345563548280%22%2C%22sourceFrom%22%3A%22bj%22%7D.
- [14] 宣勇, 张鹏. 组织生命周期视野中的大学学科组织发展[J]. 科学学研究, 2006, 24(a02):366-370.
- [15] 万力维, 周川. 控制与分等:权力视角下的大学学科制度的理论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2006(5):23.
- [16] 刘小强, 彭颖晖. 一流学科建设的三种导向:价值的冲突与统一[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9(01):64-68.
- [17] 武建鑫. 走向自组织: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 湖北社会科学, 2016(11):158-164.
- [18] 黄容霞, Lennart Wikander. 一个学科国际评估的行动框架——以学科评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案例[J]. 中国高教研究, 2014(2):42-46.
- [19] 徐操志, 完颜绍华, 许庆瑞. 组织创新的生命周期观[J]. 科研管理, 2001(6):44-49+8.
- [20] 宣勇, 张鹏. 组织生命周期视野中的大学学科组织发展[J]. 科学学研究, 2006, 24(a02):366-370.
- [21] 张务农, 娄枝, 李永鑫. 国内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引入监测评估的行事逻辑[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4):33-39.
- [22]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07.
- [23] 乔治·凯勒. 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M]. 别敦荣, 译.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5.
- [24] 钱佩忠, 宣勇. 学科发展:大学战略规划的基础[J]. 教育发展研究, 2006(23):54-58.
- [25]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等, 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5.
- [26] 张盖伦. 评估指标成了高校学科建设的指挥棒?[EB/OL]. (2019-08-12) [2019-08-12]. http://edu.zjol.com.cn/jyjsb/gx/201908/t20190812_10787862.shtml.
- [27] 张继龙, 陈廷柱. “双一流”建设中的学科发展规划:战略、管理及有效性——基于两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案例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7):26-33.
- [28] 王亚杰, 陈岩, 谢苗锋. 英国学科特色型大学发展战略特征与政策建议[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1(1):11-17.

- [29] 钱佩忠. 基于学科生命周期的高校学科带头人工作重点与策略[J]. 中国高教研究, 2013(3):42-46.
- [30] 宣勇, 杨奕. 大学学科组织成熟期及其表征——基于国家重点学科的调查[J]. 教育发展研究, 2008(1):30-34.
- [31] 钱佩忠. 基于学科生命周期的高校学科带头人工作重点与策略[J]. 中国高教研究, 2013(3):42-46.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Value Choice in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ZHANG Wunong LI Aiji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a university can be attributed to its excellent strategic planning which consists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planning as a basic component. However, there is no universal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notation and measurement framework, so a suitable strateg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needs to be sought for specific disciplines; a university is not expected to balance all values in th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so a targeted value orientation is required for specific disciplines; in addition to an external blueprint for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sustained impetus for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s also needed internally.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rientatio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should take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characteristic advantage" and "discipline life". The former can provide an equal competitive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and avoid a pyramid-lik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he latter helps plan disciplines according to their "life attributes" and "life phases", focusing on the whole life process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only those fully-developed stronger disciplines. In the light of the understanding above and the basic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lanning should adopt "knowledge activities" as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characteristic planning"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discipline life" as the basis for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first-class discipline; strategic positioning; characteristic positioning; discipline life